贵刊虽名为《文献》，但实则意义重大。原本，于我等从事古代史学研究者而言，因古代文献是研究之基，懂得分辨并正确阅读理解文献正是开展研究的第一步，因此拜读贵刊是日常的必修课。但坦白而言，现如今史学研究者中擅长阅读理解文献者有之，懂得分辨者则甚少。所以辛德勇先生才忧心忡忡地指出，目前引用几无史料价值的著述作为研究依据者不在少数（见《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备入门书籍——读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收入黄永年《古文献学讲义》，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311页）这一现状。可以说，文献学素养的缺失是横亘于文史研究者面前的一大障碍，而这一障碍却又是非突破和跨越不可的，结合近年来伴随经济发展而起的史学研究热潮，相信贵刊在此际无疑可以肩负起更多的责任与担当。换言之，晚辈盼望贵刊不仅是作为展示新文献、发掘已有文献未知价值的重要平台，如能在此基础上加以升华，在为学术界提供平台的同时，也能反哺学术界，引领促进学术发展，立足于文献，却又不囿于文献，从而更进一步推动文史研究发展，则功劳大焉。

最后，再次向张志清馆长及贵刊诸位先生表示感谢！

从传统文献研究到现代文献学的转型

史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先贤提出科学整理国故，奋力实现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然而至今一百馀年，中国的很多学问仍然停留在前近代，并未完成这一转型，尤以传统文献研究为甚。传统的文献研究主要包括古籍的校勘、版本、目录、辑佚、辨伪、鉴定等领域，但是细致分析之后不难发现，这里的校勘、辨伪是研究方法，辑佚、鉴定是研究目的，版本、目录是研究对象，完全不是同一层次的内容，以此概括文献研究显然存在着重大问题。而文献学的一些教科书认为文献研究应当包括从文字、音韵、训诂到义理乃至辞章的方方面面，举凡文献所记载的内容都归入文献研究的领域之内；甚至还有用“‘中国古典’学”来概括传统文献研究的主张。这样的认知必然使人怀疑传统文献研究究竟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还是面向文献的同类研究的庞杂集合。

我们知道任何学科都需要有自己明晰的研究对象、概念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不与其他学科交叉、重叠，这样才能使之成为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文献学恰恰缺乏这样的明确共识。如果传统文献研究仅仅是一种无所不包的面向文献的研究，肯定是无法构成一门现代性学

科的。时下国内的学科目录中与文献研究有关的并没有称为“文献学”的一级学科,只有一些从属于某些一级学科的子学科类目,例如从属于历史学的“历史文献学”,从属于文学的“古典文献学”,从属于哲学的“哲学文献学”,从属于自然科学史的“科技文献学”,等等。是不是将不同学科属性的子学科,例如上列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哲学文献学、科技文献学相加,就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学科了呢?由于这些子学科的基本学科属性是由其上位类学科所确定的,将这些子学科强行组合起来仍然无法构成一个独立的学科。这样较低的学科地位和分散的从属关系恰恰表明,中国学术界并没有对于文献学的统一认识,也不认为文献学有其独立的学科地位。这种现状与文献研究的定义模糊不清、泛滥无归是密切相关的。另外,文献研究又常常被当作各个学科的应用性学问,当各学科的研究者从事本学科研究之初需要调查和处理文献时,文献研究才有其价值;而一旦到了更为深入的程度,文献研究就不再受到重视。久而久之,学术界将调查和处理文献的工作视为研究进程的初阶,甚至认为文献研究仅仅具有工具性,而没有其独立的学术地位。正是因为传统的文献研究存在以上种种问题,所以难以走上现代化转型之路。

在研究对象方面,传统文献研究主要是面对中国刻本文献,因为刻本是自宋代以来主要文献形态,而且传世数量最多,但中国古代至少经历了简帛文献、写本文献、刻本文献三个阶段,仅仅以刻本文献当作古代文献的全体显然是不够全面的。甚至可以说,以刻本文献为主体的文献研究“忘却”了文献史一半的内容。以往因为简帛文献、写本文献几乎没有传世,传统文献研究无所用力,但是随着二十世纪以来简帛文献、写本文献的大宗出土,已经为“全局性”的研究准备了丰富的资料。目前,这些新出形态文献的研究被当作文献研究的一个小分支——出土文献研究;而一般文献研究者在使用它们时,仍以传世的刻本文献视角为主,认为出土文献仅仅在补充或校正传世刻本文献时才有意义。可是最近二十年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这种的认识是存在重大疑问的。前沿研究认为,凡是简帛时代产生的文献必然带有简帛时代文献的特征,凡是写本时代产生的文献必然带有写本文献的特征,它们的特征可能在转化为刻本之后大量损失。对于雕版印刷技术普遍使用之前的文献,如仍然使用刻本文献的方法来研究,必然会出现重大失误。武汉大学于亭老师指出,从刻本文献研究归纳出来的定理和方法在从事出土文献研究时往往失效。这正是学术界对于出土文献的价值判断失误所致,如果任由这种错误的认知普遍存在,必然制约文献研究的深入和全面推进。出土文献并非仅仅在校补传世刻本文献时才有意义;简帛文献和写本文献应当是早期文献研究的直接对象:其特殊文献载体对于文本形态的塑造、文献意义的表达、文献信息的传承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完全无视文献形态的研究必然陷入误区。

与此相似的是金石文献,这类文献一直被当作纸本文献加以研究,因为石刻可以经由传拓和传录的方法转化为纸本文献,而后代研究此类文献时往往无视其金石载体的特殊性,导致金石文献研究中仅仅重视其文本,而金石载体反而不在视野之内。这种脱离具体文献载体的文献研究无疑是片面的。

从研究方法方面而言,任何一个学科,它的研究应当举证出具体证据,其论证过程应当符合基本逻辑,而且可以通过重复证据和逻辑推演加以验证,其研究方法和基础理论都可以通过基本教科书和工具书加以概括和总结,使后来者可以将这门学问学懂学会并且传承下去。同时学者们还要时时对于学科的理论 and 范式加以反省,推进本学科的进步。就如自赵万里先生以来,已经在尝试建立科学的版本学体系和类型学的范式,他的《中国版刻图录》就是现代版本学的奠基之作。最近上海图书馆郭立暄《中国古籍初刻翻刻先印后印研究》做出了进一步完善版本学体系和方法的尝试,而且利用版刻的类型性差异分析解决了学术史的若干重大问题,较之赵万里先生的研究更为精细,既发挥了传统版本学的优势,又确立了科学版本学的典范。他们的著作,将传统的如同老吏断狱式的版本学从观风望气、不行诸文字的层面,转化为科学的、可验证的,使版本学成为可以习得与传承的学问。在活字版方面,艾俊川也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在文献用纸与文献装潢、修复等领域,杜伟生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都是现当代文献学界自觉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尝试与努力,非常珍贵。

基于以上的讨论,尝试提出独立的科学的现代文献学的定义:它应当是一门以研究文献的生产、流传、利用、管理等为主要内容,兼及文本与载体之间在时间、地域、组织、权利、学术等几个维度之间的张力及其变化的学科。文献学应有其自身固定的学科领域、概念体系、理论与方法;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上与其他学科划清边界。这种文献学是可以通过基础教科书和工具书积累、传授和习得,其研究成果可以使用普通的逻辑过程实现论证,也可以通过重复具体的资料与理论加以验证。它有其自身的学科属性,不是某一个特定学科的附属学科,也非所有学科的初阶文献处理过程。具体而言:

文献的生产包括著述、编纂、注释、校勘、修订等文献生成方式,文献记录、缮写、雕版、摹绘、复制、跨媒体转移的工艺过程以及任何一种方式或环节对于文本可能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文献的流传与利用应当包括传授、习得、诵读、编译等,也涉及文献的鉴定、消费和流通等社会性过程。

文献的管理则是指对于文献内容的著录、分类、索引、重组;也包括文献实体的典藏、借还、装潢、修复、保存、禁毁等。

如果这样定义和构建文献学,将非常易于催生文献学的问题意识,前近代模

式的文献题跋式的研究,将转化为科学的现代化的有问题意识的文献学研究。以上对于文献学定义的尝试肯定是非常不成熟、不完善的,之所以敢于提出来敦请学术界讨论,正是由于文献学非常迫切需要这样的理论建设。

建立现代文献学,除了文献学界的自我学术反思之外,可能还需要另外两门学科的助力,即国外的书志学和现代的计算文献学。

历史上,中国的文献研究者基本上不涉及国外的书志学知识,对于这一在国外已有着悠久历史的学科非常陌生,这是时代使然。站在今天这样的历史结点,中国文献研究不应当再自外于世界文献学。中国的文献虽有其独特性,但是古今中外的文献更有其共性,外国书志学在学理层面所做的归纳,应当有适用于中国文献的部分。特别是针对中国传统文献研究缺乏方法与理论自觉的状况而言,对于外国书志学的引介就显得尤其必要。近年来,复旦大学苏杰翻译了若干国外书志学的重要著作,做了一系列基础工作,非常值得赞扬。因为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国外已经非常成熟的书志学的学科领域、概念体系、基本方法和理论,用以对照我们的传统文献研究,以利发挥我们的优势,改进我们的缺陷,并与世界书志学界对接。中国未来的文献学应该积极与外国书志学展开对话,并有所贡献。中国文献学与国外书志学的对应,不仅是为了沟通中西学术,更是为了实现文献学现代化转型的目标,并进而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应有的声音。

计算文献学是新兴的文献学研究路径,使用统计与建模的方法整理文献,迫使我们回答文献学的本质和基础问题,也提供了以全新的角度审视文献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论和学科意义的可能性,因此是一面非常重要的镜子。特别是当最近的人工智能研究发现,仅仅建立在统计基础上的信息管理是难于有突破的,基于人类认识基本规则的人工智能才是重要方向。这提醒我们,传统文献研究与计算文献学将不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研究传统文献的方法和理论,应该能为计算文献学的突破提供支撑。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文献学自身也需要首先完成现代化的转型;从而使文献学这一最古老的学科(比如“文献”一词出自《论语》,传统文献学界也将其鼻祖至晚追溯到孔子),在与最前沿的计算文献学合辙同轨的进程中,焕发新的生机。

文献学需要不断增加本学科的深度,提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才能增加对于人文学术研究的贡献值。文献学需要将个人的经验、知识、智慧,以论文、专著、工具书或数据库的形式发表出来,固定下来,提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来采撷。文献学需要时时关注其他学科的最新进展以及对于本学科的要求,时时回应这些要求,这才是增加贡献值并确立自身学科地位的不二法门。

《文献》杂志一直是中国文献学的重要学术刊物,是本学科领域的标杆,热切盼望《文献》担当起建立、完善中国文献学,并实现其现代化转型的重任。